

三百年王朝兴衰实录

下册

大清王朝十三帝

崔清北 著

展现历史真实细节
杜绝野史演义戏说



家庭书库

大清王朝执掌二百九十六年江山社稷，兴衰荣辱荡气回肠。清王朝的十二位皇帝，文治武功各有千秋。在他们离去的背影中，浸染着一个帝国的沧桑日暮。

清王朝的崛起为封建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机，它的衰落又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瓦解。在这个特定时代的十二位皇帝，自然是开国之君，有治世之帝；又有亡国之君，堕落之帝。

大清王朝 十二一帝

下册

崔清北著



Contents · 目录

下册

清仁宗睿皇帝颙琰（嘉庆）

爱新觉罗·颙琰，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1760年11月13日）生，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1820年9月2日）卒，庙号仁宗，谥号睿皇帝，葬昌陵。三十六岁登极，在位二十五年，享年六十一岁。年号本意是嘉祥吉庆，实际上确实乏善可陈，时代已经抛弃了他，他力图守成，却无法迈步了。

温谦：一个傀儡皇帝的做派.....	1
杀戮：贪官、佞臣、权臣的倒台.....	4
惊骇：弱不禁风的紫禁城.....	14
病患：一个时代的睁眼瞎子.....	23
中庸：竹篮打水的守成之君.....	27
嘉庆年表大事记.....	32



清宣宗成皇帝旻宁（道光）

爱新觉罗·旻宁，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1782年9月16日）生，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2月25日）卒，庙号宣宗，谥号成皇帝，葬慕陵（今河北省易县清西陵）。三十九岁登极，在位三十年，享年六十九岁。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他在历史中的形象由枯瘦渐变成干瘪，了无生气。

生当如是：清代惟一嫡长子即位的皇帝	.. 36
惰气、小气：不成格局的精明人 40
挖地开矿：经济政治的分离与合并	.. 45
鸦片战争：业已结束和刚刚开始 48
藏拙、伪善：不称职的继位人 62
道光年表大事记 66

清文宗显皇帝奕詝（咸丰）

爱新觉罗·奕詝，道光十一年（1831年）六月初九日生，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卒，庙号文宗，谥号显皇帝，葬定陵（今河北省遵化市清东陵）。二十岁登极，在位十一年，享年三十岁。咸丰是清朝最后一位秘密建储继位的皇帝，少有见识，风流，缺乏担当。

一弟一妃：错位的帝王梦 68
肘腋之患：八旗兵制的最后衰竭 73
战和不定：首鼠两端者自取其辱 81

声色犬马：惊弓之鸟已成缩头龟.....	87
运筹帷幄：一个女人的权力挖掘.....	92
咸丰年表大事记.....	100

清穆宗毅皇帝载淳（同治）

爱新觉罗·载淳，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856年4月27日）生，同治十三年（1875年）十二月初五日卒，庙号穆宗，谥号毅皇帝，葬惠陵（今河北省遵化市清东陵），六岁登极，在位十三年，享年十九岁。同治十八岁虽“亲裁大政”，却“恪遵慈训”，只“亲政”两年，就患病死去。同治朝的历史责任，不在载淳，而在慈禧。

垂帘听政：“女皇帝”的政治地图.....	103
母子歧心：棒打鸳鸯劳燕分.....	107
食子毒虎：慈禧政治生活的牺牲品.....	113
同治年表大事记.....	117

清德宗景皇帝载湉（光绪）

爱新觉罗·载湉，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卒，庙号德宗，谥号景皇帝，葬崇陵（今河北省易县清西陵），四岁登极，在位三十四年，享年三十八岁。载湉是清朝最悲苦的皇帝，无论是国家政治还是个人生活他都背负了太重的冤屈和束缚。

福兮祸兮：慈禧的“又一个儿子”	120
帝党与后党：孩儿班较量老母班	124
维新与守旧：非极限的考验	129
被拯救的皇位与被毁灭的爱情	135
亲上加亲：冰冷的距离	140
生死时速：等不及政治翻盘点	145
光绪年表大事记	148

宣统帝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正月十四日生，1967年10月17日病卒，初葬北京八宝山公墓，1995年1月26日移葬河北省易县清西陵华龙陵园。三岁登极，在位三年，享年六十一岁。没有庙号，也没有谥号，不仅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皇帝终于从“天子”回归到凡人，所有的尊贵和威权都已过去。

名正言顺：两位皇帝伯父的惟一儿子	151
偷名盗世：皇族内阁的独舞	154
威胁利诱：窃国大盗的翻云覆雨	157
声名变迁：废帝、傀儡、战犯到公民	166
琴瑟不谐：五个女人的青春往事	171
八旗贵族凄惨落魄的生活	188
宣统年表大事记	193

清仁宗睿皇帝颙琰（嘉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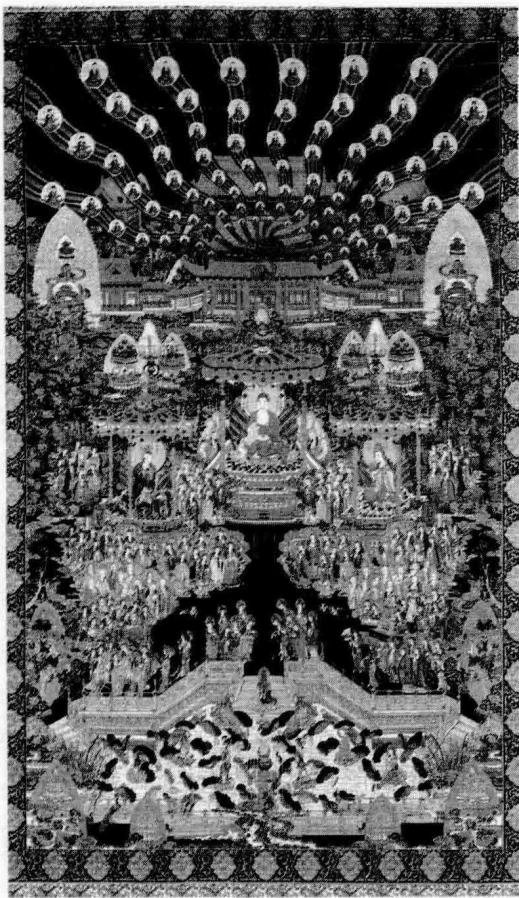
爱新觉罗·颙琰，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1760年11月13日）生，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1820年9月2日）卒，庙号仁宗，谥号睿皇帝，葬昌陵。三十六岁登极，在位二十五年，享年六十一岁。年号本意是嘉祥吉庆，实际上确实乏善可陈，时代已经抛弃了他，他力图守成，却无法迈步了。

温谦：一个傀儡皇帝的做派

乾隆有十七个儿子，颙琰排行第十五，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月初六日，生于圆明园“天地一家春”，生母魏佳氏，本为汉军，抬人满洲旗，改魏佳氏。

在乾隆诸皇子中，颙琰是比较勤学的一个。颙琰六岁就傅，十三岁即通五经，曾向工部侍郎谢墉学做今体诗，向侍讲学士朱珪学做古文、古体诗，“援笔立就，动成典则”。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四岁，乾隆亲书其名，缄藏于正大光明匾之后，颙琰从此定为皇储。十五岁大婚后，“日居书室，惟究心治法源流，古今得失，参稽考证，寒暑罔闻”。实录所记往往有所夸张，但看来确较其他皇子聪明，才智稍优。颙琰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储，他的年龄也是优势，乾隆计划做六十年皇帝，那么推算到那时继位的皇帝年龄不能太大，要保证下一任皇帝的工作年限。在年龄相当的皇子中，颙琰的才能又是出类拔萃的。

在他二十一岁时，朱珪受命为福建学政，临行前赠颙琰“五箴”：曰养心、敬身、勤业、虚己、致诚。颙琰以此“五箴”为座右铭，力行不懈。二十四岁，随乾隆东巡，到盛京，谒祖陵，以“守成”赋诗



彩织极乐世界图轴

言志。在盛京驻跸时，《恭和御制启跸盛京之作元韵》写道：“尝祭思开创，时巡念守成，待瞻幽洛地，大业缅经营。”

颙琰幼时曾居毓庆宫，分邸后移居东华门内的撷芳殿，秘密建储后，又命居毓庆宫，并赐匾曰“继德堂”，行耕耤时特命从耕播种。乾隆五十四年封嘉亲王，后每岁东西两陵的春祀、坛庙的祭祀多命颙琰代行，这暗示其已被密定为接班人。在从建储到即位加训政的二十多年里，颙琰了解了一些情况，思考了一些问题，因此他对朝廷大事还是有一定见识的。

乾隆归政后，以太上皇名义训政，宫内时宪书，仍用“乾隆”年号，各省改用“嘉庆”年号。乾隆经常御殿，受百官朝贺，嘉庆处于陪侍地位。朝鲜使臣记载目击说：嘉庆“侍坐太上皇，上喜则亦喜，笑则亦笑”，又记载：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崩于紫禁城养心殿。颙琰在乾隆死后亲政，不再是傀儡了。

嘉庆四年正月初四，也就是乾隆死的第二天，嘉庆即向各路带兵大小官员们指出：“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借以冒功升赏”，说他们“寡廉鲜耻，营私肥蠹”，并且指出他们这些人“往往托词请假，并非实有祭祖省墓之事，不过以所蓄之资，

回籍置产，此皆朕所深知。可见各路带兵大员等，有意稽延，皆蹈此藉端牟利之积弊”。以至在京的谙达、侍卫等，遇有军务无不迎求前往，“自军营回京者，即平日穷乏之员，家计顿臻饶裕”。他尖锐地指出，官员营求军务实际成了他们的生财之道，这确实是当时军队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

同时他还大胆指出乾隆政策上的错误说：“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以致形成军事上的种种弊端，如在战争中“纵有挫衄，亦皆粉饰其词，并不据实际陈奏。伊等之意，自以皇考高年，惟将吉祥之语入告”，“伊等第次奏报，杀贼数千名至数百名不等，有何证验？每不过任意虚捏”。他指出：“似此掩败为胜，岂不贻误重事！”

特别是，他能把军营积弊和百姓的利害联系起来，更是灼见。他在此谕中指出，军营肥蠹之资，“皆婪索地方所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岂能供无厌之求？”谕中还指出：“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即屡次奏报，所擒戮者，皆朕之赤子，出于无



嘉庆皇帝古装行乐图

奈，为贼所胁者，若再加之胶削，势必去而从贼，是原之贼未平，转驱民以益其党，无怪乎贼匪日多……”

嘉庆的另一个大胆明智的见解是看到了和珅的揽权问题。和珅的所作所为，如不立即解决，就会不可收拾。因此在乾隆死后几天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和珅及其党羽，使朝政暂时稳定下来。

杀戮：贪官、佞臣、权臣的倒台

和珅为所欲为，加之乾隆对他的骄纵，在统治阶级内部必然带来恶劣影响。文官阿谀奉承，贪污腐化成风，武官冒功邀赏，搜刮地方的恶行比比皆是，特别是和珅担任几次主考官和教习庶吉士，这些进士、庶吉士拜官后都要称他为老师。因此在乾隆晚年，和珅是宫廷的实权人物，这种形势迫使嘉庆不能不立即采取果断的措施，把和珅除掉。

嘉庆在四年正月初四日上午发出严谕，指出带兵大小各员营私舞弊现象后，责令他们“涤虑洗心，力图振奋”，并表示要“言出法随，勿谓幼主可欺也”，实际上是为除掉和珅制造舆论，并把矛头指向带兵官员，以麻痹和珅。大概在作好了一些准备之后，初五日又进一步提出：“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于是在正月初八日，即据给事中王念孙等的弹劾，将和珅及追随依附和珅的户部尚书福长安一并夺职下狱，十天后，即正月十八日，列出和珅二十大罪状，赐自尽。和珅死时年约五十（《清实录》）。嘉庆果断地、迫不及待地解决和珅问题，绝不是偶然的。

和珅贪得无厌，一贯利用职权，借内外大臣进贡珍奇物品之机中饱私囊。嘉庆在一道禁止内外大臣呈进贡物的谕旨中曾说：“我皇者颁谕，禁至再至三，只因和珅揽权纳贿，凡遇外省督抚等呈进物件，准递与否，必须并向和珅关白，伊即擅自准驳，明示有权。而督抚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是以我皇



和珅府花园湖心亭旧址

考屡经禁止仍未杜绝。”大臣进贡是和珅的招财进宝之道，当然他就不会认真执行乾隆禁止呈进贡物的旨意。同时，乾隆每次赏收一二件，也是一个漏洞，因为大臣们每次进贡时，要考虑乾隆选择的余地，不知哪件称心，便不得不多送数件。《春冰室野乘》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孙文靖士毅归自越南，待漏宫门外，与珅相直。珅问曰：‘公所持何物？’文靖曰：‘一鼻烟壶耳。’索视之，则明珠一粒，大如雀卵，雕成者也。珅赞不绝口，曰：‘以此相惠可乎？’文靖大窘，曰：‘昨已奏闻矣，少选即当呈进，奈何！’珅微哂曰：‘相戏耳，公何见小如是。’阅数日，复相遇直庐，和语文靖：‘昨亦得一珠壶，不知视公所进奉者若何。’持示文靖，即前日物也。文靖方谓上赐，徐察之，并无其事。乃知珅出入禁庭，遇所喜之物，径携之以出，不复关白也。其权势之恣横如此。”这一段记载虽是传闻，或与事实有出入，但于情理上是可能的。同书内还载有和珅供词，其中一段为：“又家中银子，有吏部郎中和精额，于奴才女人死时，送过五百两，此外寅著、伊龄阿都送过，不记数目，其余送银的人甚多，自数百两至千余两

不等，实在不能记忆。”从此段供词中，亦可见当时朝中权贵依附和珅的情势何其严重。据《啸亭杂录》载，和珅之妻死于嘉庆三年，曾“发殡于朝阳门外，一时王公大臣无不往送，余（后来袭礼亲王的昭梿）亦从众而行。比至，车马壅阻，因饭于农家。逆旅苗姓有老妇云：‘观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骄溢已极，祸不旋踵，奈何趋此势利之途，以自伤其品也？’余赧以退。……当和相擅权时，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初欲终身以赖之者，乃其智反不若一村妇识也。”可见当时权贵们奉承和珅之严重。另据《国朝耆献类征》载，嘉庆四年九月，正当乾隆梓宫下葬，途中嘉庆曾面询两淮盐政征瑞，据征瑞自己承认，曾以“银二十万两，因为和珅妻故送致。彼时和珅意存见少，伊欲增至四十万，是以未收。而从前曾送过和珅二十万。当经收受。此外和珅交办缎匹物件等项并奇巧之物，不可胜计”。这段是嘉庆在处理征瑞的谕旨中引述的，可见和珅妻死，权贵们送银两是存在的，而且不在少数。接着嘉庆在谕旨中又说：“试问天下为属员者，馈送上司，有银至数十万两者乎？其意下不过欲以交结取悦，冀图和珅常为庇护，可久留两淮盐政之任，不复更换，藉以便其私图，自肥囊橐。”可见当时对和珅的贪婪，权贵的阿附，上自皇子、王室，下至村妇，无不观察得十分透彻。

嘉庆从和珅的熏天权势当中看出了潜在的危机，因此在关于和珅问题的谕旨中曾指出：和珅的问题一直未解决，表面上是因为群臣顾虑“皇考圣寿日高，不敢烦劳圣心”，而实际上则是“畏惧和珅，钳口结舌，不敢参奏”，以致达到“罪状多端，举朝痛恨”的程度。将和珅拿获下狱后，正直官员立即起来历数和珅的罪状，直隶总督胡季堂很快拟奏了和珅的种种悖逆不法、蠹国病民、贪婪放荡、目无君上的罪行，并认为只有以大逆论，方能“上纾太上皇帝在天之愤怒，下快天下人心之积恨”。可见和珅的民愤是很大的。乾隆死后第二天，嘉庆命和珅与福康安昼夜守灵，不得擅离，这实际上削夺了和珅军机大臣、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的大权。接着，初八日，给事中王念孙上书弹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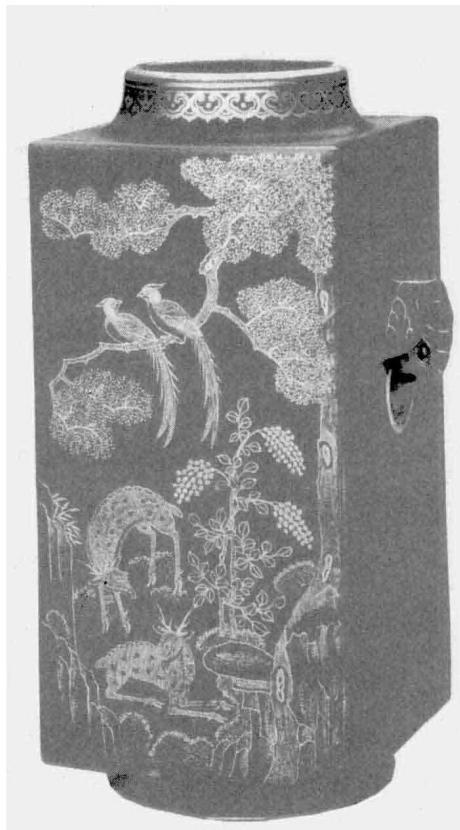
和珅。于是，嘉庆下令将和珅革职，逮捕入狱，并宣布其二十大罪状。

从宣布的和珅二十条罪状中，可以看到他的种种罪恶表现。罪状的第一条是，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嘉庆被立为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和珅即抢先于九月初二日向嘉庆递如意，以邀拥戴之功。这显然是和珅用对付乾隆的办法来奉承嘉庆（和珅正是用这些“小忠小信”来博得乾隆赏识的），嘉庆厌恶这种作风，故将之列为和珅的头条罪状。

第二、三、四、六条是说和珅骑马、坐轿越过园内、宫内规定的界限；娶出宫女子为妾；乾隆生病后仍谈笑如常，均属违制，可见其狂妄傲慢，目无君上。

第五条、第七至十二条系指斥其对待外省、军营的奏报任意延搁或驳回；皇帝朱批字迹不清擅自撕去另拟；命其兼管吏部、刑部、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他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乾隆死后，嘉庆命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却命已、未出痘者均不必来京；随意推荐、升擢自己的亲信，而对军机处记名的人员又任意撤去等等。这些是说明其揽权专擅行为的。

第十三至十六条所列罪状，系指和珅家盖楠木房内装多宝格、隔断仿宁寿宫，园寓点缀仿圆明园的蓬岛瑶台，坟茔内设享殿；家内收藏珍珠、宝石数量及规格俱超过御用之物。特别是从他家抄出正珠朝珠，家人还供称：“和珅日间不敢戴用，往往于灯下无人时私自悬挂，临镜徘徊，对影谈笑，其语言声息甚低，即家人亦不得闻悉。”这几



霁蓝描金象耳琮式瓶

条，虽亦属违制，但与一般违制不同，嘉庆认为，“此种情况，竟有谋为不轨之意”，若此事败露于正月十八日以前，即不照叛逆凌迟处死，亦当予以大辟。可见问题之严重。

和珅二十大罪状详细如下：

“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

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其大罪二。

又因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直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其大罪三。

并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罔顾廉耻。其大罪四。

自剿办教匪以来，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心欺蔽，以致军务日久未竣。其大罪五。

皇考圣躬不豫时，和珅毫无忧戚。每进见后，出向外廷人员叙说，谈笑如常，丧心病狂。其大罪六。

昨冬皇考力疾披章，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竟另行拟旨’。其大罪七。

前奉皇考谕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其大罪八。

上年十二月内，奎舒奏报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聚众千余，抢夺达赖喇嘛商人、牛只，杀伤二命，在青海肆劫一案，和珅竟将原奏驳回，隐匿不办，全不以边务为事。其大罪九。

皇考升遐后，朕谕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不遵谕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京。全不顾国家抚绥外藩之意，其居心实不可问。其大罪十。

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迈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隐



体和殿款黄地蓝料彩陶蝠花口花盆

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其大罪十一。

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其大罪十二。

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其大罪十三。

蓟州填塋，居然设立享殿，开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其大罪十四。

家内所藏珍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

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其大罪十六。

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其大罪十七。

且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其大罪十八。

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与小民争利。其大罪十九。

伊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财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

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其大罪二十。”（以上见《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嘉庆四年正月甲戌）

最后，嘉庆以康熙诛鳌拜、雍正诛年羹尧为例，赐和珅在狱中自尽。福长安以阿附和珅，令其到和珅死所跪视，并革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职，逮下狱，籍其家。和珅诛后，其党羽皆惶恐不安，有的朝臣上疏，力主穷追其余党。

嘉庆四年正月十九日，即赐和珅自尽的第二日，嘉庆即发出安民告示，在谕旨中说：“昨经降旨……已将和珅赐令自尽矣……此案业经办结。因思和珅所管衙门本多由其保举，升擢者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员奔走和珅门下，逢迎馈赂皆所不免，若一根究连及多人，亦非罚不及众之义。且近来弊端百出，事难悉数……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实为其贻误军国重务，而种种贪黩营私，犹其罪之小者。是以立即办理，刻不容贷。此外，初不肯别有株连，惟在儆戒将来，不复追咎既往，凡大小臣工，无庸心存疑惧。况臣工内，中材居多，若能迁善改过，皆可为国家出力之人。即有从前热中躁进，一时失足，但能洗心涤虑，痛改前非，仍可勉为端士，不至终身误陷匪人。特此再行明白宣谕，各宜凛遵砥砺，以副朕咸与维新之治……”此旨在策略上是比较高的，谕旨下达后，官员们即稳定下来，继续为嘉庆效力了。

由于和珅长期踞于相位，肆意黩货，所搜赀财已盈千累万。《清稗类钞》说：“和珅在乾隆朝柄政凡二十年，籍没家产，至八百兆有奇。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从记载上看，和珅的家产是非常多的。

和珅的家产究竟有多少，各书记载，甚为悬殊。《庸盦笔记》载：十一王爷（永瑆）、盛住、庆桂等查抄和珅家产，“共有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价，仅已估者二十六号合算即达银二亿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此文附录清单中记有：正屋一所，十三进七十二间；东屋一所，七进三十八间；西屋一所，七进三十三间；徽式屋一所，六十二间……金元宝一千个，每个重一百两，

计银一百五十万两；银元宝一千个，每个重一百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估银一千七百万两；生沙金二百余两，估银一千八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洋钱五万八千元，估银四万零六百两；制钱一千零五十五串，估银一千五百两。……地亩八千余顷，估银八百万两。……而《殛珅志略》、《查抄和珅家产清单》则载：正屋一所，十三进七百三十间；东屋一所，七进三百六十间；西屋一所，七进六百二十间。有数字可计之银两数（据《履园丛话》载，一两金按二十两银换算）为七千三百万五千两。可见有很多出入。《殛珅志略》所载房间数，以现存遗迹对照似乎太多，《庸盦笔记》所载则接近实际。《清稗类钞》所云籍没家产“至八百兆（即八万万两）有奇”，恐亦不实。因为有记载的乾隆三十一年全年赋银收入才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余两，八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二十七年的赋银，此数显然偏高了。比较接近实际的，还可能是官方的数字。《清实录》记和珅二十大罪状，第十七至十九条都是揭露和珅贪黩的内容，其数为“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两）”，“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两）”，“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两）”。金一两仍按银二十两算，共计一千零七十四万两。另有其家入刘全家产二十余万两。这一数字比传抄材料少得多，因公布较早，可能不是全部数字。据档案记载，此后又继续查抄的财产计有：嘉庆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永锡等折奏：查得海甸和珅花园内房一千零三间，游廊楼亭共三百五十七间（系以前赏赐）；马圈一所，计房四十三间；善缘庵寓所房八十六间，游廊四十二间；园内有金器十七件，金锞九个，银器五十件。另在热河尚有寓所一处，陈设玩器戏衣等若干。二月三十日直隶总督胡季堂奏：大城等七县查出和珅及家入呼什图米、麦、豆、杂粮共一万一千零六十五石。三月十八日绵恩等继续查出和珅借出本银所开当铺十二座，家入刘全等四入伙开当铺八座，和珅契置取租房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一千二百六十六顷，通计银二十万三千三百两。和珅还有借出应追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一十五